

中
国
学
术
讲
坛

思维
文化
诗学

河南人民出版社

郑敏……著



思维

文化

诗学

河南人民出版社

郑敏· · · ·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维·文化·诗学/郑敏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6

(中国学术讲坛)

ISBN 7-215-05411-X

I. 思… II. 郑…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5380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数 230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6.00 元

诗、哲理和我

(代序言)

诗是高高枝头上的桃子,充满鲜活的生命的果汁。哲理是那深埋在黑土里潮湿的地气,矿物质,甚至人肥。从哲理到诗,一段不可预测、无从计量、无限曲折的变化历程。它包括人的无意识,社会的无意识,民族的无意识,诗人的无意识,读者的无意识。无意识才是那只写诗的手;意识,逻辑在无意识的邀请下建设了精美的天梯,从那上面缪斯徐徐步入人寰。我和诗的缘分开始在青少年。那时我的母亲和一些大家族里受过私塾教育的孩子们,都喜欢用闽调咏古诗,让我领略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回肠荡气、慷慨激昂、柔情万种的抒情力量和音乐性,所以在中学时期最吸引我的就是语文课的诗词部分。最早接触的《古诗十九首》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课下自己开始半懂不懂地读些词,特别是岳飞的《满江红》,李后主(即李煜)和李清照的词。当时我既不了解这些词的历史背景,也不真正理解作者的身世和他(她)所要表达的情怀,但词中的一弹再三叹的感慨和节奏感,以及词藻的美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应当说是古典诗词的音乐性和汉语文本字词本身所自有的魅力吸引了我,启发了我对文学的审美本能。

20世纪40年代,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一年级阶段,闻一多、

徐志摩、卞之琳、废名(冯文炳)等人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进入了我的阅读范围。特别是徐志摩的《偶然》和废名的一些极富禅意的诗对我这个喜爱诗的哲学系学生有着异常的魔力,在这类诗的启示下,我写了自己的第一首诗《晚会》,并且在当时由一些联大师生主编的昆明报纸的副刊上登出。但诗真正进入我的心灵还是在二年级一个偶然的时机。作为一名哲学系的学生,学校规定必修德文。当时有两个德文班,而我被分配到冯至先生的德文班上。这个偶然的决定和我从此走上写诗,并且写以“哲学为近邻”的诗,有着必然的关系,因为我从那时起就在冯至先生的《十四行集》中找到自己的诗歌最终的道路。许多许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在写新诗方面我无意中走上冯至先生在《十四行集》中所开创的那条中国新诗的道路,可能因为在求学期间我和冯至先生一样同时涉入哲学和诗歌两个水域,套用德里达的一句话,柏拉图和老庄永远出现在我的面前,而我总在倾听他们和缪斯的对话,并且寻找表达他(她)们对话的汉诗艺术。我的诗歌文本很少很少能完成它所肩负的对深刻的感受和思想的艺术转换这一崇高职责。我为此深深负疚,这是永久的遗憾和无奈。

历史有时是一个略带恶作剧的导游,在我出生和成长的时代,光辉的中华古典文化传统被错误地和封建政治体制草草打上等号,我的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是五四运动后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教育,很少读古籍,虽说大学时名师所开的魏晋玄学、中国哲学史和人生哲学都是我十分喜爱的专业课,但因为自己古文很差,没有亲读古籍,对于中国光辉的文史哲古老文化只有一些二手、浮光掠影、破碎不全的印象,而且历史的误导,两次文化的大“革命”(指五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打击),都旨在打倒非专制的中华光辉传统文化,使我直到晚年才真正意识到一个古老东方民族抛弃自己先人的文史哲智慧,失去自己脚下几千

年丰沃的精神智慧的土地是多么大的损失和痛苦！今天在全球化时代，一个伟大的民族立身在世界面前，必须保有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身份，才能展示他自身特有的智慧……当然这里所说的中华文化传统必须是洗净封建专政渣滓的民族文化传统。可惜在今天的大中小学的教育里并没有设置这样一门传授国民文化素质教育的课程，使得青少年在全球化时代，强势外国商业文化一拥而入的面前，失去判断力和独立思考，不顾中国的国情，盲目追求一人一车、超前消费、衣食住行追赶时尚、生命价值观强调物质财富、时间就是金钱等浮华的所谓现代化的生活，而一度成为我们的民族美德的十载寒窗、勤俭节约却成了落后的思维的代表。在资本主义国家，富豪家族也许需要几代的创业，而今这里却是一夜就能登上富豪榜。精神物质、灵和肉，集体和个人之间失衡，已在青壮年强势族群间成为一种时代的流感，历史的导游者在和我们开玩笑，我们之所以不能快速地遏制这种时代流感，是因为在埋头经济建设的同时，忽视了保护精神文化。教育聚焦在科技知识的传播，语文、外语失去精神文化载体的本质，沦为致富的工具，人文学科为科技考试让路，大中学教育制度正在大力向理工科倾斜。掌握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思想正悄悄地在社会潜意识中繁殖。这些失衡的偏向在 21 世纪就会在中青年的文化素质，特别在道德伦理上留下印记，影响民族整体的价值观和精神境界，成为中国走向一个全球化时代真正现代化先生大国的拦路隐忧。只有在教育界真正认识到复兴中华五千年古老文化的精髓在这个历史阶段的重大意义时，上述所说的那种严重的错误偏向才可能得到纠正。因为西方现代化文明的一种明显的副作用就是由强调物质进步、重视科学滑向科学主义：人文理想为之变质，使物欲扩张而精神追求萎缩。对于今天在商业社会中成长的青壮年，物质肉体是实实在在的现实，而精神灵魂则是虚缈的。经营物质现实是大多数人的

生目标;短期兑现的实利主义已成为普通人的为人之道。商业现实主义在今天已经代替了20世纪中国智识界所拥有的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的人生观。

上面我之所以讲了这些似乎走题的话,实在是要说明在什么样的历史发展中,我从青年迷恋诗歌走向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又怎样在岁月的流失中陷入对人类命运的忧思。从思考而焦虑,而困惑,对人类文化前途的焦虑,近来成了我关注的核心。如今我常常在想的是:历史上多次出现人类的乌托邦理想,如孔子的圣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柏拉图的乌托邦,米尔顿时代的英国共和国,法国大革命后的短命的共和,20世纪的许多共产主义国际实践等,都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类乌托邦理想。这是不是说明,历史是一个提着理想的灯笼的引路人,人类不能没有这理想之光的照烁而前进,但这又是一次永远达不到“理想”之乡的旅行。理想,这吸引人类的光源,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前进的停顿就是死亡,因此我们不能止步不前,但理想的目的地却又是永远达不到的。这种清醒而冷静、痛苦而明确的认识,也许是20世纪以来所产生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本质内涵,与它以前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古典主义文学艺术在认识论上根本的不同之处吧。这本小书《思维·文化·诗学》虽说因为是一些论文的结集,没有体系,但却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后,在时代的思维、文化、诗学森林的曲折林径中漫游时所拾到的一些鸟羽,枯叶,碎石,虫蛻……它们都沾着些风痕雨迹,或可引游人停步遐思。

长征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会永远走下去,永远惊讶于星空、海潮、巅峰的再现,再消失,再现……

时间的足迹如丝,串起无数的理想追求中的高峰与低谷,这就是人类的历史吧。

目 录

诗、哲理和我(代序言)	1
-------------------	---

上编 思维与文化

从结构观走向解构观的必然性	3
“迪菲昂斯”(Differance)	
——解构理论冰山之一角	11
对 21 世纪中华文化建设的期待	29
教育与跨学科思维	36
历史时刻: 中华文化传统的复兴与教育改革	42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应否关注世界文化与文学	
理论的发展	56
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 一个老问题的新状况	66
解构主义在今天	76
解构主义是否已过时?	94
从汉字思维到汉语文化的复兴	100
全球化与文化传统的复兴	103
传统流失与外国文学影响	111

是时候了:汉语必须找回它自己	115
在物质丰富与精神境界间的平衡 ——论当前人文学科改革的迫切与方向	119

下编 诗 学

一、新诗的反思	135
中国新诗八十年反思	135
关于中国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	149
时代与诗歌创作	157
今天新诗应当追求什么?	164
对 21 世纪文学阐释理论的希望:“心的回归”	171
新诗与传统	177
企图冲击新诗的几股思潮	187
关于汉语新诗与其诗学传统十问	191
二、诗论	194
诗与朦胧	194
诗与悟性	196
一种新诗:世纪末迷人的疯狂	198
诗歌与文化	200
创作与艺术转换 ——关于我的创作历程	202
传统中写新诗	207
诗与历史	211
我看中国新诗	216
诗人到死诗方尽	218
全球化时代的诗人	221

三、访谈 225

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

——与吴思敬先生谈诗..... 225

郑敏先生访谈录..... 233

探求新诗内在的语言规律

——与李青松先生谈诗..... 258

郑敏访谈录..... 277

附录

文化的问题

——走近郑敏先生..... 284

作者简历..... 296

主 编

思维与文化

从结构观走向解构观的必然性

20 世纪后半叶,西方思想界出现一种思潮,即解构思潮,又称后结构主义。它诞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法国,当时由于受我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法国青年中产生了激进的学生运动。在文化思维的层次上,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也反映了对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形而上学的价值观、真理观、认识论的重新审视。结构语言学家索绪尔及其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追随者使得这诞生在 20 世纪初的结构语言学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结构文学理论的基础,迈出了西方古典文艺复兴甚至浪漫主义理论中弥漫着的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阴影,而使西方文论获得一种类科学的色彩,以适应 20 世纪崇尚科技工业的心态。以符号系统代替古典文论及文艺复兴以来强调神学及人文主义人道的西方文学艺术理论,是一次惊人的现代主义突破,这种结构批评学在法国的符号学理论家罗兰·巴特的《S/Z》著作中达到高峰。然而结构主义文学评论及它的理论基础结构语言学,按照后结构主义的解构家 J. 德里达的说法,并没有完全走出形而上学的中心论。形而上学的神言(逻各斯)中心论在符号语言学及文论中转换成口语及语音中心,压制书面语及书写;符号中心论压制广义的语言;能指与所指僵化对立,压制活的运动中语言能指与所指非对立、相转换的运动,并因

此诱发感性(能指)与理性(所指)、具体与抽象间的分裂。凡此种都说明结构语言学并没有完全破除形而上神学及人文主义对中心论的依赖及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的惯性统治。这就是后结构主义诞生的起点。

解构学派诞生后很快就由它的奠基人 J. 德里达通过讲学等学术交流活动传播到美国,形成耶鲁大学解构批评学派,并在西方很快渗入人文学科的许多领域。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出现了在解构理论影响下的文学艺术后现代主义、解构历史观、解构语言学、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一时间在学术界、创作界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当代思潮。但是解构理论的盛行并非因其是一种时尚理论,它的诞生有其在人文、历史、自然科学诸方面的原因。它的诞生是必然的,因为它的出现结束了西方文化以结构思维模式作为正统的整个历史时期,而开始了结构—解构相反又相辅相成的时代。这种结构—解构两种思维交替运行,使得西方文化思维真正进入多元时代,破除了以一个中心为权威、两种力量对抗的“正统”力量统治及压制“边缘”的精神及文化的状态。这个全新时代的的到来使得西方文史哲学者猛然以一个全新的结构—解构视角重新审视过去的诸多学说和定论,特别是关于绝对真理的起源与终极的可知性、历史记载的绝对客观性、文本解读的确凿性、权威性、可穷竭性、时空的隔离对立、知识的整体与绝对正确的可掌握性,等等,凡此类在形而上结构体系中被坚信不疑的学说都受到挑战与质疑。形而上结构体系与解构理论的根本差别在于形而上结构体系是建立在一个预设的、永恒不变的宇宙观上,其完整、和谐是超越的、本质的,而解构理论是立足于宇宙万物无一不是时刻在变中生存。这种运动既非起于神旨,也不由人的理性所控制。结构是运动中的结构功能,解构是运动中的另一种功能,它使得结构的中心不断地转换,因此没有一个结构是永恒不变的。这种充塞

宇宙的运动,以德里达的术语来说,就是“歧异”或“踪迹”的运动。歧异与踪迹都是无形的能量,它们的运动就是从“无”生“有”,“有”又解构为“无”。与这种歧异运动相同义的另一个德里达的术语就是“总书写”(writing in general)。至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德里达如此不遗余力地反对索绪尔的以口语、语音为语言中心的理论。因为德里达的所谓语言之根在于“书写”,不在口语的语音,其真义是要透过有形的语言寻找西方文化的活的创造力,甚而直溯宇宙万物的活的创造力,名之曰“总书写”,其内涵与老子的“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极相似。在老子是无名无形之道生万物,在德里达则是无名无形的踪迹(trace)运转生出由无限“歧异”(differance)集成的宇宙、世界和人间。同样是“无”能生“有”,老子讲“道”,德里达讲歧异、踪迹的运动(difference)或“总书写”。“歧异”有两种拼法,有“a”字者是无形的,与具体的“歧异”(有“e”字)是完全不同的,正如同无形的“总书写”与具体有形的“书写”(writing)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

从上述可以看出,结构主义的索绪尔在20世纪初迈出古典形而上学的阴影固然是十分了不起的一步,但德里达自结构主义迈向解构观的一大步就愈加艰难不易了。结构语言学以符号系统说使得语言成为有形世界各种关系的总体系,以语言符号系统而非“神”的话语涵盖了有形世界的关系网;而解构理论则突破有形的语言,进入无形的语言——道,用以演示宇宙万物的生成与解体。这就是德里达为之大声疾呼的“总书写”、“踪迹”、无形的“歧异”。

上面讲到解构理论的诞生是必然的,有其历史的、人文的及自然科学的原因。在20世纪初,受工业革命中科技威力出现的启发,人文学科中的语言文学都希望增加其本身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重实证,重物质,重理性,轻情感,这样就诱发了世纪初语言学的结

构主义和40年代的英美文学理论的新批评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的教训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又促使人文学科反省其世纪初所取得的结构主义的新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震动了人文主义自文艺复兴以来对人的理性的崇尚,法西斯的残暴与疯狂动摇了人文主义对人类富理性、尊严、崇高的种种美好的信念的盲目崇信,历史证明并不能以人们美好、完整的结构设想来阐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逻辑推理所获得的因果的必然性也不能顺理成章地解释许多人类社会的现象。科技、工业曾使人们自豪,深信可以以之征服自然,索取丰富的物质,但是人的创造发明,在后工业时期成为人们难以驾驭、时常带来意外天灾人祸的力量,环境污染、原子弹的超常杀伤力等等,都使人们怀疑人类的聪明才智是否总是可以引以自豪。这些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遭遇与社会现象使人们走出对自身的过高评价,同时认识到似乎拥有科学性的结构思维并不能突破理性主义中心的框框来摆正人和自然、人和自己的关系。在高度的科技、物质文明面前,人类发现自己并没有比世纪初更接近自己设想的理想世界,而自然对科技文明的许多反应更是出人意料地向人类提出许多挑战,使一向依赖理性和逻辑思维、以之为判断中心的人大惑不解。在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长期以来以“征服自然”为己任,此时则意识到人、天对立的态度的不利。相对论的诞生突破了时空、物质精神对立的传统观念。弗洛伊德心理学引进了无意识的理论,突破了理性对人类精神的统治,指出无意识是人的创造力之地下源泉和行动的幕后导演,并认为无意识是语言的真正家园。更重要的、更直接的影响来自原子领域的探讨,在这方面至少有两个自然科学里程碑使人类思维走出传统的结构思维、牛顿式的宇宙观,而进入当代开放、解构的思维,这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学说。

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及他和玻尔提

出的哲学上的“并协性原理”出现后,自然科学打破了以精确/错误、主观(观察者)/客观的二元对立思维来观察宏观、微观世界,同时对牛顿的时空静止的和机械因果律统治一切的宇宙观也作了修正。自然的丰富、复杂、奇特远远超出了人类以自身的理性逻辑思维的结构所能包容的。英国人 W. C. 丹皮尔在其《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一书中告诉我们,“物理学的实用部分都不能不考虑到事件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他又说:“近代以来在牛顿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经过改造而在 18 世纪及 19 世纪风行一时的哲学上的决定论,今天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得到物理学的证明了。人们所称道的老的科学定律,今天已证明或者是我们插入自己的自然界模型中的公理,或者是概率的陈述。”从上述的自然科学的突破不难看出解构理论的非决定论、非二元对抗论以及对静止不变的由一个中心来操纵的结构之否定。

既然 20 世纪的历史经验、社会现象以及自然科学的前沿发现都指向解构理论,为什么人们仍迟迟不愿接受人文学科方面的解构理论呢?这主要是几千年来强调知识的完整体系建构和向往超稳定的社会结构,造成人们对结构思维的独宠和依赖。人们一旦发现自己是生存在千变万化充满偶然性的运动中的宇宙,并无永恒不变的避风港时,不免深深陷入失落与惶惑,所以迟迟落后于自然科学家的心态和思维。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人文学科多已走出这种依赖结构的文化心态,对解构学说不但能接受,而且能之以观照人文世界中的诸种现象。

中国由于仍处在科技补课的发展阶段,对人文学科的前沿理论尚未给予应有的关心。然而开放时代的活力往往不由我们做主,将我们冲到世界的浪涛中。如何冲浪?是抱着顺应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之变而变的解构无定解的心态,还是抱着将客观纳入